



元刻本刘因诗文集《静修先生文集》。



容城三贤广场的刘因雕塑。

白沟河边忆斯人

■相关

刘因的诗文里出现有定兴、徐桥、满城、易州、遂城、雄州等地名,这些于他都是寻常家乡风物,亲切可感,顺手拈来,撮入笔下。

在诸多地名里,白沟则是特殊的一个。

白沟即白沟镇,位于白沟河与南拒马河汇合之处,曾经作为辽宋界河,历经风云变幻。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年),辽国举兵进犯北宋,攻打定州、瀛洲,皆未成功。澶州战役中,辽军主帅萧挾查看地形时被宋军射死,于是辽宋双方媾和,缔结了澶渊之盟,规定双方以白沟河为界河,之后两国保持了118年的和平共处局面。

风云际会,白沟小镇凸显于历史舞台,频繁出现在宋人诗文中。

初步统计,《全宋诗》中,言及白沟的作品有25首,“艺祖杯柔不耀兵,白沟如带作长城”,“故国黍黍悲清汴,落日风沙惨白沟”,“草莽死未忘哀愤,岂但幽云恨白沟”,“年年相送桑乾上,欲话白沟一惆怅”……中肯说来,这些语句诗艺一般,诗情却颇可观,撰著者中有王安石、杨万里、文天祥等大家与名家。

白沟镇距离容城县城仅六七华里,遥想静修先生(刘因号静修先生)当年,登高即可望见,澄江如练,平畴旷野,淡烟疏林,读书之余,劳作间歇,足可游目骋怀,敏感的心灵时时受到触动,走笔成文。

传世的刘因诗作中,有三首和白沟密切相关,其中两首皆题为《渡白沟》,其一感慨深沉,“一声霜雁界河秋,感慨孤怀几千古”,“古称幽燕多义烈,呜咽泉声泻怒愁”,诗人心头萦绕了太多的陈年往事,两宋、辽国、蒙元,历史像蒙太奇一般倏忽而过,百感交集,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;其一风格则是沉郁劲健,“燕赵山河分上镇,辽金风物异中州”,“四海知名半凋落,天涯孤剑独谁投”,情绪不免有些低落,大概是刘因晚年所作,故交凋零,落寞难耐,徒自感伤。

另一首七言律诗题为《白沟》,更为有名,“宝符藏山自可攻,儿孙谁是出群雄?幽燕不照中天月,丰沛空歌海内风。赵普元无四方志,澶渊堪笑百年功。白沟移向江淮去,止罪宣和恐未公。”

宋朝开国初期,对辽国一味妥协退让,自以为得计,可获长治久安,孰料战略失误,执政无方,生存空间一步步被挤压,终致靖康国难,北宋灭亡。南宋偏安,国界迁移到了江淮一带,同样是以求和苟安为上策,不思振作,但最终还是难逃蒙古铁骑的无情蹂躏,凄惨落幕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生主编有《全元诗》,收录元代5000位诗人近14万首诗篇,当今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,提到元代诗坛状况,首选刘因,此为不二人选。至于赏析名篇佳作,则首选其《白沟》一诗,正所谓大浪淘沙,锦泽绵长。

清代诗人彭蕴章写有《题元人诗十二首》,其中一首专咏静修先生:“蓟门策马起新愁,落日西风渡白沟。吟到孤云心迹冷,柴桑高趣卷中收。”精准把握了刘因绝意仕宦、清高傲岸的人格主旋律,揭示出诗人和陶渊明心意相通,一脉相承,堪为异代知音。

彭氏势必娴熟静修诗文,但他特意拈出“白沟”字样,可见静修《渡白沟》《白沟》两题三篇在他心目中的分量,“白沟”成了静修先生形象的标配。

日居月诸,千年已逝。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建设,给白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。

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站在白沟河畔,思绪万千,先贤的光荣与梦想,终将沉淀凝聚成为我们心底的一份自信与豪情。

文/刘立志

刘因：元朝北方理学传播者

□张冬菱

■阅读提示

刘因,元朝北方理学大家、诗人、文学家,是连接宋明理学的重要桥梁,与同时期的许衡、吴澄并称元初三大理学家。他祖籍雄安新区容城县,少有大志,师从名儒。他声名显达,却不慕名利,一生清贫,曾因朝廷两次征聘不就,被元世祖忽必烈称为“不召之臣”。一代大儒,开馆收徒,自编教材,著述颇丰,以自己的教学和著述,为元代初年理学向北方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开馆收徒 弘扬儒学

雄安新区容城三贤广场,矗立着容城三位贤德之士的雕像,其中之一,就是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。

刘因,字梦吉,号静修。他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(1249年),蒙古灭金后的第15年,他的家乡在冀中平原腹地,雄州容城(今雄安新区容城县)沟市村。

刘因年少时聪颖过人,胸怀抱负。

《元史·刘因传》中记载,他幼年及少年时,“三岁识字,日记千百言,过目即成诵。六岁能诗,七岁能属文,落笔惊人,甫弱冠,才气超迈,日阅方册,思得如古人友之,作《希圣解》。”

刘因在《呈保定诸公》中,也曾写道,自己“八岁书草字,观者如堵墙”。

父亲刘述为刘因求访名师,刘因12岁便得到了居于真定(今正定)的元代名儒砥弥坚的教导。

博闻强识、勤学善思的刘因,很快就得到了砥弥坚的赏识。砥弥坚曾对刘述赞叹道:“令子经学贯通,文辞浩瀚,当为名儒。”

年少时的刘因,也常常借助诗文,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。

在《呈保定诸公》中,他写道,“遨游《坟》《索》圃,斯蹬孔颜堂。远攀鲍谢驾,径入曹刘乡。”他仰慕孔子、颜回,想做与鲍照、谢灵运、曹植、刘祜等并驾的名仕。

十八岁时,刘因又作《希圣解》,“天地之间,理一而已,爱其厥中,散为万事,终焉而合,复为一理。天地,人也;人,天地也。圣贤,我也;我,圣贤也。”刘因借此明志,“人皆可以为圣贤”。

然而,元朝初年,尚未实现科举取士。一心想积极入世、有所作为的刘因,没有任何渠道出任做官。

做不到则兼济天下,刘因转向以传承儒学为己任。

1274年,刘因在易州(今易县)开馆收徒。3年后,回到家乡容城,继续传道授业。刘因教学,不同于一般的乡村塾师照本宣科。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,能将理学思想贯注其中,不但新颖独特,而且思想深刻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,他还亲自编订和撰写了一批辅助教材和参考书籍,颇具革新精神。这在当时绝无仅有,很快引起时人的注意,慕名而来的学子越来越多。

为了指导学生读书,刘因写了著名的《叙学》一文,畅谈对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说以及诗文字画等方面的思考见解和学习方法。为向学生传授义理之学,他写成《四书集义精要》《四书语录》《易系辞说》等多部著作。

很多高官也专程来拜访他,但刘因并不热衷,能避则避。

正如刘因的《墓表》中所记:“先生授徒,深居简出。性不苟合,不妄接人。保定密迹京邑,公卿使过者众,闻先生名,往往来谒。先生多逊避,不与相见。不知者或以傲,先生弗恤也。”

刘因门生众多,史上有姓名可考的就有二十多人。《宋元学案·静修学案》列有刘因弟子七人:乌冲、郝庸、杜萧、李道恒、君举、李天策、林起宗等。

清初大儒孙奇逢称,刘因还有三台籍(今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)弟子八人,包括梁师恭(以经行明修被征为翰林院侍讲)、梁师安(出资为刘因建庙立学)、王刚、刘英、梁泰、李蒙、王果、李贞等,皆“负笈从游,为建书院于三台”。

未能通过仕途报效国家的刘因,最终走上了教授经学义理、弘扬儒学的学术道路。

“不召之臣” 终选归隐

刘因一生中,不是没有出仕的机会,但因为各种原因,最终选择了延续自己的教书生涯。

刘因教课的名气越来越大,宰相文贞王不忽木向忽必烈极力举荐刘因。

至元十九年(公元1282年),太子真金下召,征聘刘因入朝,授予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(五品)之职,教授宫中不懂汉族文化的近侍子弟。

少年便有报国志的刘因感到时来运转,终于可以入朝为官,一展自己长久以来的才学与抱负,于是欣然进京。

作为一介儒生,教授乡里,能得到朝廷的征聘成为朝官,是新的王朝对刘因的治学思想和能力的认可。

但造化弄人,刘因入朝不满半年,家中就传来继母过世的消息。按照惯例,刘因回乡,为继母守孝。刘因的第一次官场生涯,“以母疾辞归”告终。

刘因丁忧期间,京城发生内部争斗,太子真金陷入朝政巨变漩涡,忧惧而死。太子的死,直接影响了刘因的政治前途。丁忧期满,朝中却无人提起刘因复职一事。

正值壮年的刘因,熄灭了入朝为官的希望,回到自己的开馆教书本行,过起了归隐生活。

1289年,41岁的刘因喜得一子,然而第二年便不幸夭折。这给刘因带来致命性的精神打击,使得本就身体羸弱的他,百病缠身,须发斑白。

到1291年,43岁的刘因被第二次征聘。这一次,在朝臣的举荐下,刘因被征召授以集贤学士、嘉议大夫(三品)。

但刘因选择了“固辞不就”。他写了一篇《上宰相书》表明心迹,称两年前经丧子之痛,自己身体羸弱,已无心无力入朝为官。

《元史刘因传》记载,“书上,朝廷不强致,帝(忽必烈)闻之,亦曰:‘古有所谓不召之臣,其斯人之徒欤!’”

刘因“不召之臣”的评价,由此而来。两次征聘,刘因的心态为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?丧子之痛固然,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
其实,第一次征聘就职时,刘因就“因性不苟合,不妄交游”。为官期间,由于朝廷内部权力争斗,刘因不能与在朝的其他官员友好交往,压抑的官场氛围和抱负得不到真正的施展,让其非常失望。

元代陶宗仪的《辍耕录》中记载,有人问刘因,为何“一召而起”,如今却“固辞不就”,刘因回答,“不如此,则道不尊。”

“邦有道则仕,无道则隐”,是许多中国文人推崇的出仕原则。

所以,二次征聘时,刘因所秉持的儒家思想,对他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他认为元朝在推行汉文化上并未尽全力,他感到元朝不是他理想中能够行“王道”的政权,若出仕辅之,则有辱儒道之尊。

1293年初,国子助教吴明又向朝廷举荐刘因为国子祭酒。但45岁的刘因,由于病情恶化,于当年的四月十六日辞世,葬于容城拒马河畔。

理学大家 诗冠元初

刘因不仅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,一生还著作甚丰,把程朱理学在北方发扬光大。

刘因的《四书精要》30卷,《易系辞说》《丁亥诗集》5卷等,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这些著作,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,理学由宋到明的过渡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刘因最初跟随砥弥坚学习经学,钻研训诂疏释之说。因为博闻强记,且过目成诵,他很快便有了新的目标。当时经许衡、窦默、姚枢等人的提倡,在南方被公认为“正学”的程朱理学开始传播到北方,引起刘因

的极大兴趣。

刘因的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,他对程朱诸书,如饥似渴,手不释卷,并能做到触类旁通、举一反三。

但刘因以朱熹为宗,又不严守朱熹门户。在天道观方面,他将生生不息的变化归之于“气机”,主张专务其静,不与物接,物我两忘。

在为学方面,刘因主张读书当先读六经和《语》《孟》,然后依次读史、诸子,主张读书“必先传注而后疏释,疏释而后议论”。

刘因认为,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,天地万物皆由理所生,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理。宇宙天地之中,只有一个共同的理,即天理,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。

刘因继承了前代哲学家“观物”的思想,认为通过对自然界和具体事物的认识,可以发现宇宙的“理”,即规律性的东西。通过这个理,可以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运行发展的规律。

刘因不仅是北方理学的传播者,他的诗,也名冠元初诗坛。

他一生写作诗歌800余首,留下广泛行世的诗文集《静修集》。

过着归隐生活的刘因,留下了大量讲述隐逸生活的诗作。如“诸公久矣笑吾贫,是处云山欲结庵。只有皇卿解资助,山须面静修庵。”“院静复夜静,幽人世虑轻。是非容勿辨,忧宠莫多惊。”“巧隐林旁无四邻,背山向水得天真……鸟声似向花枝说,曾见无怀有此民。”

包括他的七十六首“和陶诗”,都可视为为他内心的自画像,抒发了他像陶渊明一样淡泊隐逸的情怀。

其中,《贺咏贫士》中写道:“陶翁本汉族,田园犹可依。我惟一亩宅,贮此明月辉。翁复隐于酒,世外冥鸿飞。我性如延年,与众不同归。孤危正自念,谁复虑寒饥。努力岁云暮,勿取贤者悲。”

刘因钦慕陶渊明的纯洁品格,固守贫贱。即使过着“我惟一亩宅,贮此明月辉”的拮据生活,也时刻不忘自己的秉性,“与众不同归”。

在刘因去世后,元顺帝至正九年(1349年),为刊行刘因著作,元顺帝特颁圣旨。

圣旨中写道:“(刘因)负卓越之才,蕴高明之学。说经奚止于疏义,为文务去乎陈言。行必期于古人,事每论乎三代。汉唐诸子,莫之或先;周邵正传,庶乎可继。”

其中,称赞刘因才识卓越,学问高明,品格高尚,思想纯正,可与汉唐诸子比美,是宋代理学的正统继承人,还肯定他“上可以禅国家之风化,下可以为学者之楷模”。

而且,圣旨中还描述了这位一生致力于教育的教育家,深受学子追捧的场景:“户外之屦常满,邱园之帛屡来,咸虚往而实归。”可见刘因教学的受欢迎程度和效果。

这道“圣旨”,可以说是元代对刘因作出的极具分量的官方评价,也是对刘因一生学术思想和贡献的积极肯定。

刘因去世后,元仁宗延祐年间,赠刘因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,追封容城郡公,谥号文靖。

1910年,刘因从祀孔庙。从祀孔庙的元代贤儒只有七人享此殊荣,刘因便是其一。



容城发现的刘因墓碑和承载墓碑的磁瓦。

本版图片均由张冬菱提供